

# 回顾 与 前瞻

——19—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讨论集

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编  
河南大学中文系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## 目 录

### 剑气箫心龚诗魂

#### ——兼论龚自珍对近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影响

.....关爱和( 1 )

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学观念之演进.....陈鸣树( 17 )

论中国诗歌向现代转型前夕的格局.....骆寒超( 30 )

### 小说全面革新的理论导引

——五四小说理论批评概说.....严家炎( 58 )

### 30年代“无产阶级文学”观的本质特征与思想源流

#### ——对苏联、日本和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一种考察

.....刘中树、张福贵( 74 )

### 延河边上的一股文学细流

——评丁玲等人40年代初期的文学活动.....刘增杰( 96 )

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的“普列特涅夫网结”.....魏绍馨( 106 )

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之贯通.....赵福生( 121 )

关于“中国现代文学思潮”研究的几个问题.....邵伯周( 133 )

### 论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性质、对象和范围

.....黄曼君( 145 )

### 新文学运动的截流

——论胡适的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.....沈卫威( 160 )

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.....樊 骏( 179 )

现代文学思潮编纂实践的启示.....黄修己( 202 )

关于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.....刘思谦( 214 )



# 剑气箫心龚诗魂

——兼论龚自珍对近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影响

关爱和

龚自珍诗以其奇诡瑰丽、亦狂亦怨的气韵风采独步嘉道诗坛。如果我们试图在风发云逝的龚集中寻求龚诗之魂，那么，最恰切最精当的描述莫过于“剑气箫心”。“剑”与“箫”是龚诗中经常对举的词语。“剑气”与“箫心”成为龚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，并构成了龚诗特有的诗美境界。“剑气箫心”中，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，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于秋气暮霭，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、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。龚氏震撼流俗、籍以傲世者在此，龚诗幽渺奇伟、回肠荡气处在此，后人心有灵犀，神驰摹效者也在。龚氏评陶诗谓其“二分梁甫一分骚”，赞友人谓其“亦狂亦侠亦温文”，都可以看作是其“剑气箫心”作派与诗魂的自解旁注。而从龚诗对维新派、南社及五四新青年的濡染影响来看，“剑气箫心”于近代诗坛，无疑又具有某种“情感范式”的意义。

龚诗中的剑气箫心首先是一种人格期待，一种对自我品格、自

我形象的设计,同时也包含着诗人对当时整个士阶层最为需要的社会承担精神、独立不倚的思想意志和正直敢言声气的呼唤。敢忧敢愤,放言无忌,担荷天下,是为剑气;敢爱敢恨,培植情根,哀乐过人,是为箫心。

“士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,具有独特的存在意义和作用。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创造过程中,“士”不断调整完善着对自身的设计和士人格的培养。一般的来说,他们对社会充满着责任感、使命感和殉道精神,对正义、邪恶、有道、无道保持着敏锐的评判触角和思想尺度,把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去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<sup>①</sup>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崇高理想和行为风范,越是在天下纷纷,乱世无道的时代,他们越是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。

清代士策严厉。龚自珍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粱谋”的诗句之所以脍炙人口,即在于它真实地揭示了清代士人在封建专制淫威下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的境况与心态。自康熙时期,当国内社会秩序渐趋平稳之后,清朝政治便进入一个禁忌重重,文网日密的阶段。至乾、嘉盛世,统治者陶醉于百年承平、文治武功的业绩中,更是不允许他人置喙政事。历时百余年的政治专制,造成了士林中人心志萎靡、心力颓败。为官者苟且偷安,“阁部督抚,率不过奉行诏命;”著书者穿穴故纸,设坛讲学与“聚徒结社者渺然无闻”。<sup>②</sup>

鸦片战争前夕,清王朝盛极转衰,军问杳至,败象丛生。一方面是变局在即,政府的政治控制力相对减弱,另一方面是拯衰救溺,亟需补天方策与折冲扶危之人。嘉道之际的风云际会,促进了士林风气的高涨和经世实学思潮的兴起。一批惊于秋声、识在机先的士林中人,不再满足于“为天地立心”的空想玄谈,而着眼于“为生民立命”的经世实务,不再满足于“为去圣继绝学”的书斋生涯,而时时觊觎着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事功机遇。与之相适应,恢复士阶层“通古今、决然否”的心力心志,振刷士风,砥砺气节,自救救

世,成为嘉道之际一代士人的共同追求。

三代京宦的出身阅历,以“良史之忧忧天下”的社会洞察,使龚自珍对士风刷新有着更为迫切的期待。龚氏以为:“天下事,舍书生无可属”。<sup>③</sup>“士也者,又四民之聪明喜议论者。身心闲暇,饱暖无为,则留心古今而好议论”。士人“留心古今而好议论,则于祖宗之立法,人主之举动措置,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,俱大不便”。<sup>④</sup>故而,霸天下者为快其号令、嵩高其身,则恃其强武,处心积虑地摧除震荡其心力心志,“戮其能忧心,能愤心,能思虑心,能作为心,能有廉耻心,能无渣滓心,”<sup>⑤</sup>从而造成众口箝塞,万马齐喑,“政要之官,知车马服饰,言语捷给而已,外此非所知也;清暇之官,知作书法赓诗而已,外此非所问也,”<sup>⑥</sup>“通显之聚,未尝道政事文艺也;外吏之宴游,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也”<sup>⑦</sup>的局面。失去“留心古今而好议论”的风采,士人也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所应拥有的辉煌。

龚氏认为:刷新士风,陶铸新的士人气节和品格,首先当恢复其能忧能愤、能思虑作为、能有廉耻而无渣滓之心力。其《壬癸之际胎观第四》云:“心无力者,谓之庸人。报大仇,医大病,解大难,谋大事,学大道,皆以心力”。这种心力,包括援古刺今之磊然声气,宏毅敢任之坦荡胸襟,独立特行之胆略器识,贫贱不移、富贵不淫之廉耻气节。恢复心力,鼓荡心志,自当在士林中扫除麻木、苟且、昏昧、卑琐,无所作为的陋习,苏醒先觉觉民、担荷天下的责任感,培植心灵敏感、正直敢言、独立思考的品格,重振坐谈有“议论图度、上指天下画地”之气度,起行可为“议论军国,臧否政事之文章”<sup>⑧</sup>的士人风采。

龚诗对上述“剑气箫心”式的士人品格充满着自我与社会的双重期待。

“之美一人,乐亦过人,哀亦过人”<sup>⑨</sup>“我生受之天,哀乐恒过人”。<sup>⑩</sup>诗人超越常人的哀与乐来自对春花秋月的触景生情,来自

对童心母爱的拳拳眷恋，也来自“以良史之忧忧天下”所带来的忧患与沧桑之感。“佛言劫火遇皆销，何物千年怒如潮？经济文章磨白昼，幽光狂慧复中宵。来何汹涌须挥剑，去尚缠绵可付箫。心药心灵总心病，寓言决欲就灯烧”。<sup>⑪</sup>诗人胸中，来何汹涌者，为经世之雄心，救世之剑气；去尚缠绵者，是幽光与狂慧，哀乐之箫心。二者时时冲击着诗人的心防。“愿得黄金三百万，交尽美人名士，更结尽燕邯侠子”。<sup>⑫</sup>“布衣结客妄自尊，流连卿等多酒痕。十载狂名扫除毕，一丘倘遂行闭门”。<sup>⑬</sup>“刘三今义士，愧杀读书人。风雪衔杯罢，关山拭剑行。英年须阅历，侠骨岂沉沦？亦有恩仇托，期君共一身”。<sup>⑭</sup>是为剑气之抒写。“独有爱根在，拔之暑难下。梦中慈母来，絮絮如何舍”。<sup>⑮</sup>“不似怀人不似禅，梦回清泪一潸然。瓶花帖妥炉香定，觅我童心廿六年”。<sup>⑯</sup>“一天幽怨欲谁谙？词客如云气正酣。我有箫心吹不得，落花风里别江南”。<sup>⑰</sup>是为箫心之流露。剑气雄拔，表现了诗人对布衣结客、弘毅任侠，“大言不畏，细言不畏，浮言不畏，挟言不畏”<sup>⑱</sup>之狂放风度的追求；箫心如诉，表达了诗人对“情多处处有悲欢，何必沧桑始浩叹”<sup>⑲</sup>惻怛缠绵情怀的缱绻。以剑气侠骨寄托心志，其劲直高亢如长风出谷；以箫心幽思抒写奇情，其哀怨低回如林泉咽鸣。剑气箫心构成了诗人人格期待的两重境界，“长铗怨，破箫词，两般合就鬓边丝”。<sup>⑳</sup>“性懒情多兼骨傲，直得销魂如此”。<sup>㉑</sup>诗人虽以自嘲自怨的口吻说出，却又正是一种自傲自期。

不惟是自期，对于士林风尚，龚氏也抱有“颓波难挽挽颓心”的宏愿，在友朋之间，互以砥砺气节、培植元气相瞩望，在人物品藻之中，推尚心力心志。吏部侍郎王鼎，不畏权贵，以正直敢言闻名朝野，自珍以诗盛赞曰：“公之奏疏密中禁，海内但见力力持朝纲。阅世虽深有血性，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”。与之相较，那些“委蛇貌托养元气，所惜内少肝与肠”者显得卑琐不堪。诗人希望居高位者都能像王鼎那样，焕发精神，以造就“国有正士士有舌”<sup>㉒</sup>的士林风

尚。诗人之友包世臣，留心经济之学，“东南大吏，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，无不屈节咨询，世臣也慷慨言之”。<sup>②</sup> 龚诗中称包氏为“乾隆狂客”，汤鹏有《答龚膳部越鸟篇》，以越鸟比龚，以楚鸟自比，充满着广结同志，一飞冲天的渴望。自珍以诗推誉汤鹏激烈慷慨之豪气云：“觥觥益阻风骨奇，壮年自定千首诗。勇于自信故英绝，胜彼优孟俯仰为”。<sup>③</sup> 情多、骨傲、血性、锋芒、自信、英绝，从龚诗反复出现的词语中，可以领悟到龚氏期待中的“剑气箫心”式的士人格中所包蕴的内涵。龚氏《尊隐》中有“百媚夫不如一狷夫也；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”之语，其所谓的“狷夫”与“瘁民”，正是具有“剑气箫心”品格士人的代语。

当然，对“剑气箫心”士人格情有所钟的并非龚氏一人。培植元气，砥砺气节，恢复社会良知的角色，恢复对正义、邪恶、有道、无道的敏锐感触，积极参与社会进程，构成了嘉道士人共同的期待视野。“以布衣遨游于公卿间”的包世臣认为：“士者事也，士无专事，凡民事皆士事”。<sup>④</sup> 曾任台湾道的姚莹更是不无自负地说：“稼问农，蔬问圃，天下艰难，宜问天下之士，”<sup>⑤</sup> 学者林伯桐作《任说》，以为“自任以天下之重，则固天下之士也，”以天下自任，虽为布衣，“而行谊在三公之上”。<sup>⑥</sup> 诗人潘德舆以“扶掖世运”，“报国救民”自期，其告语友人：“天下不久当有事，我辈宜自勉”。<sup>⑦</sup> 嘉道士人所表现出的追步先儒风范、重塑自我品格的自觉，在衰象丛生的鸦片战争前夕，放射出熠熠光彩。先觉觉民，心忧天下，剑气箫心式的士人格在风起云涌的近代社会被不断丰富与深化，而嘉道士风为近代士人格的重建作了预备和先导。

## 二

龚诗中的剑气箫心又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一种对社会现实与人



生境遇的反应与感受。它与人格期待互为表里。人格期待注重于心力心志、内在品质的培植与陶冶；人生态度主要是指诗人对人生现实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选择。感发激奋，狂放率直，逆风土运会，是为剑气；梗概多气，伤时悯世，宕奇情逸气，是为箫心。

一代汉字大师段玉裁对外孙龚自珍寄予厚望，勉励其“博文强记，多识蓄德，努力为名儒，为名臣，勿愿为名士，”<sup>②</sup>自珍最终未能遵照段氏之言为名儒名臣，而走上了名士之路。“吴中尊宿”王芑孙读其诗文，谓其诗“伤时之语，骂坐之言，涉目皆是，”谓其文“上与朝廷，下及冠盖，口不择言，动与世忤。”<sup>③</sup>在龚集触目皆是的“伤时之语，骂坐之言”中，蕴含着诗人对社会现实敏锐而富有力度的洞察判断，对忧患人生充满个人生命体验的奇感顿悟。

龚氏对社会的观察，显示着独特的思想逻辑。他依据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，将社会的发展区分为治世、衰世、乱世三种形态，而又以人才之盛衰升降作为三世更替的显性标志。治世之时，人主得道，庶人不议，有雄才绝智不必用于世；衰世之时，一才人出，百不才督之缚之，戮形戮心，人工精英、雄材绝智者不见闻于天下；世至有才者不能自存，顿生背异悖悍之心，“起视其世，乱亦不远矣。”<sup>④</sup>龚氏“以良史之忧忧天下”，以为嘉道之际是衰世已至而乱世在即矣。在《尊隐》一文中，他惊呼春光明媚、夏日融融的宜君宜王的时代已告结束，而秋气萧瑟、悲风骤至的凄冷时节即将到来。自珍在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》中解释从治世到衰世人们往往浑然不觉的原因道：“衰世者，文类治世，名类治世，声音笑貌类治世。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，似治世之太素；官羽潜而五声可铄也，似治世之希声；道路荒而畔岸隳也，似治世之荡荡便便；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，似治世之不议”。无视由治转衰的种种蛛丝蚂迹，沉缅于承平旧梦之中，这正是世人浑浑噩噩、不思振奋的病源。龚氏《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》中又以四时更替为喻，揭示承平日久，人们茫然不辨衰世之象的社会心理原因道：“天地有四时，莫病于酷暑，而莫善于初秋，

澄汰其繁褥淫蒸，而与之萧疏澹荡，冷然瑟然，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，初秋也”。由夏入秋，人们沉溺于暑威除却的惬意之中，而无睹于秋象，无闻于秋声，昏昏然不知悲寒将至。由治世进入衰世的社会心理也是如此。这正是令识在机先的惊秋之士悲慨交集、惶惶不可终日之所在。“履霜之屨，寒于坚冰，未雨之鸟，戚于飘摇，痼痹之疾，殆于痼疽，将萎之华，惨于槁木”。<sup>②</sup>自珍以诗般隽永的文字，传达出盛衰交替之际，最难将息的心境。

这种戚于飘摇、众醉独醒的感受，在龚诗中，化为阵阵悲凉之雾：“楼阁参差未上灯，菰芦深处有人行。凭君且莫登高望，忽忽中原暮霭生”。<sup>③</sup>“秋心如海复如潮，但有秋魂不可招。漠漠郁金香在臂，亭亭古玉佩当腰。气寒西北何人剑，声满东南几处箫。斗大明星烂无数，长天一月坠林梢”。<sup>④</sup>“四海变秋气，一室难为春。宗周若蠢蠢，嫫嫫烧为尘。所以慷慨士，不得不悲辛”。<sup>⑤</sup>“名场阅历莽无涯，心史纵横自一家。秋气不惊堂内燕，夕阳还恋路边鸦。东邻嫫老难为妾，古木根深不似花。何日冥鸿纵迹逐，美人经卷葬年华”。<sup>⑥</sup>层层叠叠的忧思，驱逐不尽，斩割不断，秋气如海，心事茫茫，看花对月，皆着悲色，诗人甚至秋夜听琵琶之曲，也触动今非昔比的沧桑之感：“我有心灵动鬼神，却无福见乾隆春。席中亦复无知者，谁是乾隆全盛人……铁石心肠愧未能，感慨如麻卷中见”。<sup>⑦</sup>这类悲慨交集的诗句，抒写的并非是泛泛的伤春悲秋的意绪，它以诗人盛衰转换中的深长感慨与失落感作为底蕴，裹挟着阵阵风云之气。诗人有词云：“多愁公子新来瘦，也何曾狂醉，绝不闲吟”。<sup>⑧</sup>“绝不闲吟”语，点明诗人胸中大有梗概在。在喋喋不休、絮絮不舍叙说惊秋悲秋心境之中，在其旁出泛涌的文思、雄诡杂出的隐喻背后，蕴藏着他对世运敏锐的洞察与判断，蕴藏着诗人入世救世的热情与冲动。自珍《上大学士书》中云：“夫有人必有胸肝，有胸肝则必有耳目，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，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异同之事，有考订异同之事，则或胸以为是，胸以为非，有是非，则必有感

慨激奋。感慨激奋而居上位,其有力,则所是者依,所非者去。感慨激奋而居下位,无其力,则探吾之是非,而昌昌大言之”。龚氏一介书生,未居高位,则将胸臆之言,形诸笔端,傲世醒人。龚集中,《乙丙之际著议》、《古史钩沉》、《明良论》、《尊史》之议政,《西域置行省议》、《农宗》、《平均篇》之建策,都是感慨激奋、昌昌大言之文。其《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中的“三种决定义”、“三种旁义”、“三种答难义”、“一种归墟义”,《与人笺》中“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,望风纳款,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”的论断,都为史学家所珍视。这种“感慨激奋”、“昌昌大言”,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思考,也体现着作者对人生行为方式的选择。它将诗人的心力心志与正直敢言、担荷天下的人格期待落实到实处。

在龚诗中,感慨激奋的风云之气又与迴肠荡气的自怜意绪紧紧扭结在一起。风云之气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的思考,而自怜意绪则抒写了他对人生忧患的感悟。诗人少年曾有过五陵结客、垂杨系马的豪气:“结客五陵年少,脱手黄金一笑,霹雳应弓弦”。<sup>③</sup>“屠狗功名,雕龙文卷,岂是平生意”。<sup>④</sup>可谓剑气如虹。但阅世渐久,坎坷日多,愁云悲雾,频上笔端。诗人或怅惘于现实与理想之牴牾,或喋喋于独清独醒之孤独。“绝域从军计惘然,东南幽恨满词笺。一箫一剑平生意,负尽狂名十五年”。<sup>⑤</sup>“壮岁始参周史席,髫年惜堕晋贤风。功高拜将成仙外,才尽回肠荡气中”。<sup>⑥</sup>仗剑无计,空负狂名,壮岁无成,华年总误,诗人抚膺叹息中,隐含着怀才不遇的悲慨。“东华环顾愧群贤,悔著新书近十年。本有文章曾是病,虫多言语不能天。略耽掌故非匡济,敢侈心期在简编。守默守雌容努力,毋劳上相损宵眠”。<sup>⑦</sup>著书十年,未敢自侈匡济;收拾狂名,还须珍惜羽毛。诗人有许多诗作抒写中年忧患:“中年何寡欢?心绪不缥缈。人事日龌龊,独笑时频少”。<sup>⑧</sup>“嘉遁苦太清,行乐苦太浊。愿言移歌钟,来就伊人躅。天涯富兰蕙,吾心富邱壑。蹉跎复蹉跎,芳流两寂寞”。<sup>⑨</sup>诗人又有《赋忧患》诗云:“故物人寰少,犹蒙忧患俱。

春深恒作伴，宵梦亦先驱。不逐年华改，难同逝水徂。多情谁似汝？未忍托褻巫”。诗人对忧患孤独有着深深的体验，对忧患孤独的成因也有所反省与自讼：“醺醺心肝淳，莽莽忧患伏”。<sup>⑩</sup>“平生进退两颠簸，诘屈内讼知缘因。侧身天地本孤绝，矧乃气悍心肝淳”。<sup>⑪</sup>忧患来自情多，孤独缘于不俗，但诗人并不愿放弃欹斜谿浪、恃才傲物、冰清玉洁的本真去随波逐流，媚俗谄世，而是将童心母爱作为一片净土，作为慰藉孤独、疗救心病的的心药：“无奈苍狗看云，红羊数劫，惘惘休提起。客气渐多真气少，汨没心灵何已。千古声名，百年担负，事事违初意。心头阁住，儿时那种情味”。<sup>⑫</sup>诗人对一生忧患，半世孤独，只有悲慨而无有悔意。其晚年所作的《己亥杂诗》云：“少年击剑更吹箫，剑气箫心一例消。谁分苍凉归棹后，万千哀乐集今朝”。“少年揽辔澄清意，倦矣应怜缩手时。今日不挥闲涕泪，渡江只怨别蛾眉”。又有《丑奴儿令》词云：“沉思十五年中事，才也纵横，泪也纵横，双负箫心与剑名”。岁月蹉跎，壮志虚掷，归去来兮，悲痛何堪！

嘉道之际盛衰转换的时代，造就了“伤时之语，骂坐之言，涉目皆是”，“上关朝廷，下及冠盖，口不择言，动与世忤”的名士，也造就了对社会现实观察敏锐，对人生忧患孤独体会深切的诗人。龚诗中悲天悯人、感士不遇、愤世嫉俗、独清独醒的情感，唤醒我们对古典诗歌长河中高士骚客形象的记忆，而龚诗中惊于秋声、戚于飘摇的末代感伤 对童心母爱的深长眷依，“亦狂亦侠亦温文”的人生意趣，则是活生生的“这一个”，闪烁着个性的光彩。龚自珍是站在历史转折关口的诗人，其“善哀善怒”，“哀以沉造怒则飞”<sup>⑬</sup>的人生态度与作派，给近代志士仁人留下了一线灵犀。

### 三

龚诗中的“剑气箫心”更是一种诗美追求。其《湘月》词中的

“怨去吹箫，狂来语剑，两样消魂味”，《跋少作》中的“触之峥嵘，忆之缠绵”之语，都可以借来描述龚诗的这种审美追求。箫怨多悲慨之词，似《骚》之深长；剑狂多不平之语，近《庄》而仙、侠。悲慨之词，志深笔长，忆之而缠绵；不平之语，雄奇高亢，触之而峥嵘。剑气与箫心，构成了龚诗美感形态的两翼。

龚氏 1823 年所作的《三别好诗》，对“簪年好之，至于冠盖好之”的清代三位作家礼赞以诗。其题吴梅村集云：“莫从文体问高卑，生就灯前儿女诗。一种春声忘不得，长安放学夜归时。”题方百川遗文云：“狼藉丹黄窃自哀，高吟肺腑走风雷。不容明月沉天去，却有江涛动地来”。题宋左彝《学古集》云：“忽作冷然水瑟鸣，梅花四壁梦魂清。杭州几席乡前辈，灵鬼灵山独此声”。诗人对梅村儿女诗中的缠绵情怀、《百川集》中的风雷之声，《学古集》中的冷眼清气别具只眼，推崇备至。诗前自序以为：“自揆造述，绝不出三君”，“吾知异日空山，有过吾门而闻且高歌，且悲啼，杂然交作，如高宫大角之声音，必是三物也”。龚氏心向往之的“高歌”、“悲啼”、“杂然交作”的诗境，不正是“剑气箫心”之谓吗？

当然，自珍心目中的诗神并不仅仅如此。其《自春徂秋，偶有所触，拉杂书之，漫不詮次，得十五首》诗云：“名理孕异梦，秀句镌春心。庄骚两灵鬼，盘踞肝肠深。古来不可兼，方寸我何任？所以志为道，淡宕生微吟。一箫与一笛，化作太古琴”。《庄子》的名理异梦与汪洋恣肆以适己、出入于仙侠间的洒脱，《骚》、《歌》之秀句春心与借香草美人以写情、融家国忧思于一处的郁悒，都使诗人梦回情牵。龚氏瞩目于熔庄、骚两种精神于一炉，兼收并蓄，取精用弘。其在《最录李白集》中论白诗云：“庄骚实二，不可以并，并之以为心，自白始。儒、仙、侠实三，不可以合，合之以为气，又自白始”。并庄、屈以为心，合儒、仙、侠以为气，此是白诗精奥之所在，也正是龚诗孜孜以求之所在。

与“援古以刺今，磊然有声气”的士人格期待相一致，龚氏推尚

有见地、有感慨、有巍峨横溢气势之诗。其“天教伪体领风花，一代人材有岁差。我论文章恕中晚，略工感慨是名家”<sup>⑩</sup>的诗句，讥讽缺少感慨、无病呻吟之作是“伪体”，而叹息晚近时期，略工感慨之作如凤毛麟角，不可多觅。与一般诗评家不同，龚氏从看似闲逸平淡的陶诗中，领悟到作者之侠骨豪气与哀怨骚心。龚氏一篇《送徐铁孙序》，洋洋洒洒，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诗之宏大气象的憧憬与追寻。序曰：“平原旷野，无诗也；沮洳，无诗也；硗确狭隘，无诗也；适市者，其声嚣，适鼠壤者，其声嘶，适女闾者，其声不诚”。平原低洼与狭隘处无诗；声嚣、声嘶、声不诚者不足以言诗。诗当如何？诗当如辽东之山川，“逶迤万余里，蛇行象奔，而稍稍泻之，乃卒恣意横溢，以达乎岭外。大海际南斗，竖亥不可复步，气脉所屈，怒若未毕”。有如此之气脉声势，方可称之为诗。诗如何能获得蛇行象奔、恣意横溢之气脉声势？取原于六经诸子，汲取其莽荡噌吰之气，去其抵，去其隘，去其敷腴，扫荡“拱手欲飏，肃拜植立”、“不敢议，不敢吴言”之畏惧卑琐之态，“于是乎放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，放之乎八儒、三墨、兵、星气、五行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，不忍卒言，而姑猖狂恢诡以言之之言，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，当代故实，官牍地志、计簿客籍之言，合而以昌其诗，而诗之境乃极。则如岭之表，海之浒，磅礴浩汹，以受天下之瑰丽，而泄天下之拗怒也”。这是何等恢宏的气魄，何等广阔的诗境，它透露出一无遮拦的勃勃英气，寄托着一代士人睥睨四海、渴求建树的宏大志向。

率性任情，心作主宰是龚氏诗美追求的另一重天地。自珍是性情中人，自言“我生受之天，哀乐恒过人”。甚至“每闻斜日中箫声则病”。<sup>⑪</sup>又尝“乘驴车独游丰台，于芍药深处藉地坐，拉一人共饮，抗声高歌”。<sup>⑫</sup>诗人把诗称为“诗崇”，当作抒写性情，寄托哀乐，排遣心疾的重要手段，而追求以真黜伪，哀乐从心，歌哭无端的诗美境界。

自珍早年有《宥情》一文，设五人就“情”这一题目辩难。或据

圣人之言，以为阴气有欲而谓之情。阴气有欲，为媒嫚之民，并非美谈。或引西方之志，以为欲有三种，情欲为上，不以情为鄙夷。或以为人之异于铁牛、土狗、木寓龙者即在于有情。情不可代欲而为秽墟罪藪。对于纷纭众说，作者未直接置以可否，而自述“龚子闲居，阴气沉沉而来袭心，不知何病”。质于好友江沅，取钱枚词读之，江、钱皆病于是，“龚子则自求病于其心，心有脉，脉见童年。见童年侍母侧，见一灯荧然，见一砚，一几，见一仆姬，见一猫，见如是，见已，而吾病得矣”。这种由少年哀乐、童心母爱而引发的情愫时时而来袭心。既然攫此心疾，又斩割不断，“姑自宥之”。十五年后，龚氏作《长短言自序》，则一改《宥情》一文的闪烁其词，而理直气壮地宣称“尊情”。“情之为物，亦尝有意锄之矣。锄之不能，而反宥之；宥之不已，而反尊之”。“情孰为尊？无往为尊，无寄为尊，无境而有境为尊，无指而有指为尊，无哀乐而有哀乐为尊”。当“情”畅于声音，形诸文字时，作者之哀乐郁积得以畅释、转移，而闻此声者，也为情所动，沉浸于妙不可言的艺术享受之中。情既不可除，则索性怱恣放纵之，“虽曰无住，予之住也大矣。虽曰无寄，予之寄也将不出矣”。

由“宥”到“尊”，终至于决心“住也大矣”，“寄也不出”，表现了龚氏对“情”的钟爱与痴迷。对于心灵神明之至尊，自珍更是恂恂然惟恐褻渎。其《文体箴》云：“虽天地之久定位，亦心审而后许其然。苟心察而弗许，我安能领彼久定之云？”对天地定位这种人所共知的事实，尚要经过心审心察，方可领定，那么，抒写心迹、吟诵性情的诗文之作怎可入云亦云、模拟抄袭、言不由衷、糟蹋神明呢？自珍以一个“完”字称赞友人汤鹏之诗，以为“海秋心迹尽在是。所欲言者在是，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，所不欲言而竟不言，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。要不肯捋扯他言以为己言，任举一篇，无论识与不识，曰，此汤益阳之诗”。<sup>③</sup>自珍以为世间最为本色，“朗朗乎无滓，可以逸尘埃而登青天者”，无过于童心，故而常抱童心之澄

净,避俗心之浸淫,将童心之纯真,作心灵之归宿。在对童心的孜孜追求中,寄托着诗人对自我心灵明朗活泼纤尘不染的祝愿,寄托着诗人返朴归真、回归自然的渴望。

受天下之瑰丽,泄天下之勃怒与率性任情、心作主宰,构成了龚自珍诗美追求的主体。现实的沉重感,人生的忧患感,时时冲击着诗人的心防,惊扰着诗人的情怀。其《写神思铭》夫子自道曰:“鄙人稟赋实冲,孕愁无竭,投闲箴乏,沉沉不乐。抽豪而吟,莫宣其绪;欹枕内听,莫讼其情。谓怀古也,曾不朕乎诗书;谓感物也,岂能役乎蜚帙。将谓乐也,胡迭至而不和;将谓哀也,抑屡袭而无疚”。渴望建树、睥睨四海、磅礴浩汹的勃勃英气与莫可告语、斩割不断、不可疗救的忧思心疾,形成了阳刚与阴柔的两种极致,其氤氲化育,造就了龚诗“高歌”、“悲啼”,“杂然交作”的诗境,这便是“剑气箫心”的诗美境界。

## 四

“剑气箫心”是龚氏人格期待、人生态度与审美追求的诗意性描述。它是龚诗之魂,也是龚氏之魂。自珍在社会动荡之际所表现出的戚于飘摇的敏感,亦狂亦侠的风度,伤时使气的作派,构成了一种极富有魅力的人生境界与行为风范;其率性任情,歌哭无端,幽怨杂以慷慨,壮烈合以哀艳的诗篇,也令人耳目一新。中国近代充满着动荡与不幸,也充满着创造与变革。在旧的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,新的无能阻拦地茁壮生成的历史蜕变与社会变革中,剑气箫心所包蕴的人生境界、行为风范和情感方式嗣响不绝。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一代新学家,到南社众诗人,乃至鲁迅、郁达夫等五四新文人,对龚氏都情有所钟。康、梁仰慕自珍引《公羊》义,“讥切时政,诋排专制”的风采,自谓“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,大率人人皆经



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”，“初读定庵文集，若受电然”。<sup>①</sup>黄遵宪诗濡染度意定庵处甚多。南社巨头柳亚子推崇龚氏为“三百年来第一流”，<sup>②</sup>自称“我亦当年龚定庵”，<sup>③</sup>每当奇愁浩荡，便“挑灯自写定庵诗”。<sup>④</sup>郁达夫评南社奇才苏曼殊之诗，以为“他的诗是出于定庵的《己亥杂诗》，而又加上一脉清新的近代味”。<sup>⑤</sup>《南社丛刻》中，集龚句之作多达四百首。鲁迅有过“少时喜学定庵诗”的经历，许寿裳论鲁迅之诗，以为“才气纵横，富有新意，无异于龚自珍”。<sup>⑥</sup>在中国社会与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，龚氏都无可争议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。忧道者喜其奇警，匡国者摭拾议论，狂狷者效其“不依恒格”，恃才者慕其哀艳缠绵。透过“剑气箫心”，我们似乎可以从一种特殊的角度，窥知中国近代的士林风尚和精神风貌。这也正是我们特别看重龚诗之“剑气箫心”的原因。

· 注：

① 张载：《正蒙》。

② 管同：《因寄轩文集·拟言风俗书》。

③ 《送夏进士序》。

④⑧ 《京师乐籍说》。

⑤ 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》。

⑥ 《明良论二》。

⑦ 《明良论一》。

⑨ 《琴歌》。

⑩ 《寒月吟》。

⑪ 《又忏心一首》。

⑫ 《金缕曲·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》。

⑬ 《同年生徐编修宝善斋中夜集……》。

⑭ 《送刘三》。

⑮⑯⑰⑱ 《自春徂秋，偶有感触……》。

⑲ 《午梦初觉，怅然诗成》。

⑳ 《吴山人文澂、沈书记锡东钱之虎邱》。